

2013年1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张方志 电话:6201407
版面设计:郑虹 校对:张晗

1935年红军抢渡大渡河 “汉彝是兄弟”巧破敌防线



画册《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会议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会议期间,红军攻会理城不克。5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对会理城的围攻,沿会理西昌大道北上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此时,距会理400多华里的西昌——国民党第24军川康边防军司令兼第7师师长刘元璋部所在地一片惊慌,刘元璋急令其堂弟刘元■所部1旅从汉源调兵巩固城防,令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许剑霜,所辖王维三团防守于西昌、会理道上的锦川桥、丰站营要隘;令其三胞弟刘元琮率所部两团布防于西会道上的第二线德昌;第三线在麻栗寨,由拥有彝兵的邓秀廷扼守。

刘元琮率所部到距会理300余里的德昌时与刘元■联系,刘元■告诉他,红军已从金沙江北岸忠武山向雷打树推进,距会理不过一天半路程。刘元琮一听就紧张起来,马上令各部严阵以待,准备给到来的红军以痛击,不料四五个小时过后仍不见红军的踪影。原来,红军已于5月15日陆续离开会理城郊,经益门、白果、云甸进入德昌县境,沿安河东岸挺进。

刘元■担心刘元琮不能守住德昌,遂又增派许剑霜带兵一个团又一个营前往加强防守力量。

许剑霜是泸州、顺庆起义时刘伯承部下的一名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刘伯承得知情况后亲笔给许剑霜写一封信追忆旧谊,劝其深明大义不要阻拦红军,使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许剑霜接信后,一为刘伯承的堂堂大义所感动,二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便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敷衍。

事实上,许剑霜作为刘文辉主力部队指挥官,主要还是听命于最高长官刘文辉。由于刘文辉担心重蹈“贵州王”王家烈的覆辙,中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计,不愿替中央军“火中取栗”,对堵截红军自是尽力采取避战自保的办法。

5月16日,红3军团撤会理之围北进。同日黄昏,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1师1团行至丰站营、八斗冲一带与王维三团相遇,王团占据有利地形阻击红军。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命令红1团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丰站营和八斗冲。红1团火速奔袭,一鼓作气抢占隘口。时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动困难。双方在八斗冲一带激战至半夜,王维三接到撤退的命令。

随后跟进的红5团与红1团并肩作战,乘胜追击并攻打德昌,守德昌川军略示抵抗即溃退下来。5月17日3时许,红1师人马全部进占德昌。

刘元璋在德昌与西昌间布防了20旅旅长兼彝务指挥官邓秀廷之人马。邓秀廷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

邓秀廷奉刘元璋之命率部前出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阻止红军北进。刘伯承得知情况后派人送给邓秀廷一封信,信上写着: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开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

邓秀廷在打不打红军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刘湘、刘文辉、杨森都被他打败过,自知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在刘元璋那里不好交代。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拉开打的架势以应付刘元璋,但不交火以免伤及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邓秀廷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通过,有一个彝兵因紧张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别的彝兵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用彝话制止。红一军团前锋亦未还击,只说“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邓秀廷部未摆出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部官兵几十人。邓秀廷乘机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撤往冕宁地区。

德昌进攻战斗击溃川军1个旅,俘其200余人,缴枪1000余支。据民国年间修订的《西昌县志》卷九《兵寇志》记载:红军“洋洋而来,如入无人之境。是时旅长许剑霜,驻防德昌,交绥而退,连夜走入西昌城,德昌遂陷”。

5月19日下午,红军主力通过黄水塘后,到达西昌西南约15里的马道子。国民党设在大渡河外围的防线就这样被巧妙破除了。

(据新华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陈云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平生第一次在军队任职的陈云,以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率领部队渡过湘江,与红八军团实行整编,在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的注意,为此后光辉的革命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从未在部队担任过任何职务,对红军情况不熟悉,更无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陈云以高度的党性,精神抖擞地明确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军团任职的仅陈云一人,而且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其他5位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行军。与陈云同时分别到红八、红九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当时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前卫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迅速抢渡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过河点,拼死抵抗国民党的中央“追剿军”和从广西方面赶来的桂军。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又掩护军团主力。由于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以致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阻击,天上敌机肆无忌惮地轮番轰炸扫射,地上是敌军密集的炮火,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30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勉强渡过湘江。然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两侧国民党军开始急速向湘江合拢,红五军团大部仍滞留于东岸与敌激战,若再不抢渡湘江,将会遭到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由于军团部与师部的通信联络中断,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陈云写信派人火速送给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信中指出:“这是紧要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当天深夜12时许,陈伯钧在石塘圩接到陈云的信时,红十三师距江边还有90里,且部队打了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指战员又饥又饿,兼之未睡觉,可以说疲困到了极点。但和陈云一样深知兵贵神速的陈伯钧连饭都来不及吃,立即组织部队执行陈云的指示,连夜跑步行军90里,终于抢在敌军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在几小时后的12月1日中午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全部被敌军占领,被阻于湘江东岸地域,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大部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红军在湘江东岸一星期的激战,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作为全军后卫的红十三师能渡过湘江,与陈云在危急时刻所下的“最大的决心”、所送的这封“十万火急信”生死攸关。

在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过江的1000余人,也陷于一片混乱状况之中。为了让中央及时了解这一情况,陈云会同李卓然于12月11日向博古、朱德、周恩来作了汇报。12日,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在通道会议后和进贵州前,博古在洪州司约见了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13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根据陈云和李卓然反映的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报告,决定把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团长周昆、政委黄■另行分配工作。军委还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在以后几天内,协助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他们决定以两天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整编。通过整编,不仅充实了作战部队,也使部队恢复了严整的阵容。12月21日,陈云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圆满完成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使命。

(据新华网)

长征红军抢渡湘江 陈云一封急信曾救一个师